

关于郝天挺与云南的关系及其他

方 龄 贵

郝天挺,《元史》卷一七四有传,但关于他跟云南的关系,本传只说是“建省云南,选官属,遂除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寻升参知政事”。又说:“天挺尝修《云南实录》五卷”云云。聊聊数语而已。乃在地方志乘及碑记中,所载天挺在云南的事功,颇有足称,不可淹没。因综合所见有关资料,略为排比考说如下。

一、在大理修文庙兴儒学

郝天挺居官云南,其致力所在,可传者有两方面:一是在大理修文庙兴办儒学,二是编纂《云南实录》。请先言修庙兴学。

此事《元史》本传不载,可是志乘及碑记中实有之。旧志著录天挺兴学大理,以李元阳所纂万历《云南通志》记述为详。本书卷八学校·大理府·庙学说:

“大理府儒学在府治南,汉章帝元和二年建,唐天宝板荡,元至元乙酉,云南行省参政郝天挺迁建于郡学西五百武。”夹注:“天挺又召父老语云:‘按:皇帝昔以皇太(灵源别墅重印本作“大”,疑误)弟帅偏师入大理而伐取之,既践大位,犹曰:乐其风土,曩非历数在躬,当于彼请分器焉。此邦简在帝心如此,而学校虽建,俎豆未弘,今奉宣帝德,创立孔圣,尔民毋苦劳之惧。’父老曰:‘敢不唯命!’遂起工。”^①

天启《滇志》卷八学校志·大理府·庙学条所记略同,当本李志。

碑刻之与此有关者,见闻所及,两经《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收录,即《创建大理路儒学碑记》与《创大理路文庙碑》,一见于王昶《金石萃编未刻稿》,题《大理新修文庙记》,以上并署赵傅弼撰;另一为近年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大理路兴举学校记》,不著撰人。

《创建大理路儒学碑记》,《新志》原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八学校·大理府·庙学条“元教授赵傅弼纪略”引录,并非全文,碑中说:

“至元乙酉之春,准奏始立庙学,设教官,令赵傅弼充其职,中奉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郝公天挺实倡其议,大理路军民总管段信直忠闻而喜曰:‘文物胜事也,力有不给我取!’丁亥月正元日,承事郎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赵世延谒庙,虑事之鲜克有终,因路案议作三门,不日成之。工讫,立石以纪岁月云。”

《创大理文庙碑》载:

“至元乙酉之春,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议,恐南方之人,逸居无教,风声气习,永流于夷,繇是闻奏朝廷,令各路设教官,建儒学,帝嘉其言。中奉大夫参知政事郝公分政大理,观山川之雄丽,甲于西南,实为是邦都会之地,喟然叹曰:‘帝意美矣,学校建矣,儒教弘矣,惟吾夫子庙貌未兴,而宗师吾道者莫知所自。于是首析己俸,延僚案而集议之,其谁曰不然。是时宣抚同知赵好礼檄使是

文详之^③。

另据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赛典赤“是岁（按：甲戌，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七月抵大理，下车莅政，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之要，中庆、大理两设提举，令王荣午、赵子元充其职。”^④提举即儒学提举，观此碑的撰人赵子元署衔“儒学提举”可知。是大理先已有儒学提举之设，而未见实效；核以各碑的记载，乙酉之修庙立学，乃是大理儒学振兴的真正契机，此事实由郝天挺发端创议，捐俸集资，躬与筹措进行。先后赞助者，除脱脱木儿外，则有大理总管段忠，承事郎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赵世延，奉议大夫同知大理路总管府事赵好礼，承直郎大理路总管判官张子学，将仕佐郎大理路总管府经历田泽，宪金张贞^⑤，员外贾天佑，承务郎员外焦徽，明威将军金齿等处宣抚司达鲁花赤合只，昭武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抚使贺天爵，宣武将军同知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事高庆，将仕佐郎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经历牟进，怀远大将军麓川路军民总管府达鲁花赤阿散等人。碑中乙酉当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丁亥当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盖大理庙学经始于至元二十二年五月，告成于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⑥，历时约及二年。这对大理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当时堪称一代盛事，而以天挺之功独多，足以不朽。乃《元史》本传阙漏失载，因略补于此。

二、编纂《云南实录》

元明以来，云南志书最早者当推李京的《云南志略》，此书四卷，记云南事最详，今所存唯《说郛》所收《云南总叙》及《云南风俗》两条，合之不足一卷。其次元代记云南事而为人所习闻之书，还有郝天挺的《云南实录》五卷，见本传。但此书内容如何，从未经人称引，惟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钱谦益《绉云楼书目》著录。《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舆地类·补·元有“李京《云南志略》四卷”，又“郝天挺《云南实录》五卷”。黄虞稷是清初一位大藏书家，庋藏极富，不过《书目》所载是否悉有其书，前人已有疑辞。郝天挺的《云南实录》（李京《云南志略》同）究竟曾否入藏，抑或仅见录目，无从判明。

又《绉云楼书目》卷一地志类收有《云南诸夷图》一种，夹注：“元张立道有《云南风土记》，见本传。又郝天挺修《云南实录》五卷。”查《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立道所著诗文，有《效古集》、《平蜀总论》、《安南录》、《云南风土记》、《六诏通说》若干卷。”夹注本此。又按《绉云楼书目》署钱谦益撰，陈景云注，则夹注出景云手。看语气，钱氏实无是书，景云夹注特旁及之而已。斯绉云一炬，此书应不在与楼俱烬之内。若然，则不免使我们产生一种希望：但愿《云南实录》仍存在于天壤之间，犹有重显于世之一日。

三、仕滇年代

关于郝天挺入滇及离滇的年代，诸书不载。前举《大理路兴举学校记》说：“至元甲戌，命平章政事赛典赤云南行省，作新于民者多矣。首于大理、中庆各设提学教养之实，未果而卒。乙酉之春，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脱脱木儿继之，率多中州士夫，政令一新，民有大赖，暇日召中奉大夫参知政事郝天挺”云云。前贤惑于《创建中庆路大成庙记》“初平章赛公既始其事，甫即叙而卒，诏平章政事脱脱木儿继领省事”一语^⑦，多系脱脱木儿出任云南

平章政事于赛典赤卒年之次年，即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⑧。据碑，脱脱木儿出任云南平章实在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⑨。碑中说脱脱木儿之到任，“率多中州士夫，政令一新，”好象郝天挺等人是随同脱脱木儿一同到云南来的。在没有反证之前，可定天挺入滇之年上限为至元二十二年。至于《元史》本传所载“建省云南，选官属，遂除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寻升参知政事，”颇觉窒碍难解。考世祖一朝，曾两度设尚书省，一在至元七年至八年，与中书省并立，阿合马总之，九年正月遂废。其时云南犹未设省，何来天挺“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之事？一在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置尚书省，改天下之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二十八年正月罢之。查天挺至元二十二年已任参知政事，更与“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无干。复按参议乃中书省所设的官职，而行省不置。《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中书省参议中书省事，“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牍，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中统元年，始置一员。至元二十二年，累增至六员。大德元年，止置四员，后遂为定额。其治曰参议府，令史二人。”卷九一《百官志》行中书省条并无参议一职。据《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至元二十五年，桑哥既立尚书省，擢为户部侍郎，升户部尚书。……移疾归。二十八年，桑哥败，完泽为丞相，复擢为户部尚书，升参议。尚书省罢，仍参议中书省事。”由此观之，尚书省是设有参议的，很可能阿合马领尚书省以与中书省并立时，也有参议之设。则本传此处或可作如下解释：郝天挺在至元七年至八年之间，曾参议尚书行事（尚书省罢后当改参议中书省事），并有升迁，至元二十二年随脱脱木儿至云南，任参知政事，按行省参知政事秩从二品，《元史》本传云云，应有脱讹。推测之辞，难保其必是，仍检出以待识者论定。

至于郝天挺离滇的年代，无多可考。方国瑜教授所说：“则天挺以至元二十四年以后去滇，亦不详在何年也。”^⑩当是稳妥之论。

四、郝天挺的族属和他与元遗山的关系

郝天挺与云南的关系，可考的大抵如斯。此外值得评说的还有其他两事：一是关于他的族属，一是他与元遗山的关系。

1. 郝天挺的族属问题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赵世延杨朵儿只皆色目》条已拈出：《元史》“列传第五卷至三十二卷皆蒙古、色目人，第三十三卷至七十五卷皆汉人、南人也。”这是不错的。《郝天挺传》在列传第六十一（《元史》卷一七四），置于姚燧、郭贯、夹谷之奇、刘赓、耶律有尚诸人之后，按说应属于汉人。可是本传说：“郝天挺字继先，出于朵鲁别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肃州，父和上拔都鲁，太宗、宪宗之世多著武功，为河东行省五路军民万户。”又卷一五〇《郝和尚拔都传》：“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幼为蒙古兵所掠，在郡王迄忒麾下，长通译语，善骑射，太祖遣使宋，往返数四，以辩称。……庚子岁，太宗于行在所命解衣数其疮痕二十一，嘉其劳，进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易佩金虎符。”“子十二人。……天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郝和尚拔都即天挺之父和上拔都鲁。盖天挺祖居安肃州（今河北徐水县），到他父亲和上拔都鲁时已移居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并由此起家。《郝天挺传》说是出于朵鲁别族，而《郝和尚拔都传》不言族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八集部·总集类于《唐诗鼓吹》说：“不著编辑者名氏，据赵孟頫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又说：天挺“字继先，出于多罗别族。”并于多罗二字夹注：“原作朵鲁，今改正。”

五局合刻本《元史》本传作都鲁别族。”是馆臣于朵鲁别族读若朵鲁之别族，盖以“朵鲁”二字为辞。但《郝天挺传》下文还有“子佑，字君辅，小字朵鲁别台”的话，这小字显然是以族属为称，则应以朵鲁别三字为辞方是。朵鲁别绝非汉人、南人，而当于蒙古、色目中求之。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氏族条所载蒙古七十二种有脱里别歹，重出作朵里别歹；色目三十一一种有秃鲁八歹。日本蒙元史学家箭内互于其所著《元代社会三阶级》一文中，于蒙古脱里别歹，重出除举出朵里别歹外，并举出秃鲁八歹，注释说：“误入色目”。又于色目秃鲁八歹，注释说：“当入蒙古”⑩。并以为即《元朝秘史》之朵儿边。可从。

查《元朝秘史》第一一、一四一、一九六节有朵儿边，旁译“种名”，“种”第一四一节：朵儿边讷，旁译“种的”，第二四〇节：朵儿别台，旁译“姓”，第二六一节：旁译“种”，第一二〇节：朵儿别捏彻，旁译“种名行”；《圣武亲征录》作朵鲁班、秃儿班，又作秃鲁班；《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一二三《昭烈台抄兀儿传》作朵鲁班，《太祖纪》又作秃鲁班，卷一四四《月鲁帖木儿传》作多礼伯台，卷一三二《探马赤传》作秃立不带；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蒙古有度礼班氏，亦称朵里别歹氏；均同《郝天挺传》之朵鲁别族，亦即《秘史》之朵儿边。

按朵儿边乃 dörben 之对音，蒙古语义训为“四”。得姓之始，据《元朝秘史》第一一节总译：“朵奔篾儿干的哥哥都蛙锁豁儿，有四子。同住的中间，都蛙锁豁儿死了。他的四个孩儿，将叔叔朵奔篾儿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离起去了，做了朵儿边姓。”

由此可知，郝天挺乃是蒙古人，朵儿边氏。《郝和尚拔都传》说他幼为“蒙古兵所掠，在郡王迄忒麾下，长通译语，善骑射。”好象他不是蒙古人，此必有说。按本传多据王磐撰《故五路军万户河东北路行省特赠安民靖难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冀国公谥忠定郝公神道碑》为文，碑存弘治《重修三原志》卷一〇词翰门。文中说：“公生九岁，为国朝所得，隶迄忒（原误“武”，据本传改）郡王帐下。王见其聪敏，令给事左右，朝夕未尝离，稍长，精通译语，便习骑射。”传云“蒙古，”，碑云“国朝，”传云“所掠，”碑云“所得，”行文微异。颇疑郝氏一族为入居内地较早已经汉化了蒙古人，和上拔都鲁乱离中复预于蒙古军伍，以武功显。碑传中所说“稍长精通译语”，“长通译语”，固亦渊源有自。而碑中有“郝公小字和尚，北人淳质，以小字行”之语，尤可见此中消息。然则郝天挺以蒙古人而如此热心于在大理修文庙，兴儒学，弥觉其难能可贵了。

2. 郝天挺与元遗山的关系 郝天挺跟元遗山的关系本来是清楚的。本传说：“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受业于遗山元好问。”是天挺于遗山为门下。但已往有人不察，竟把他和元遗山的老师《金史·隐逸传》的郝天挺混为一谈的，不可不辨。陈垣先生在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业已检出：“《新元史》卷一四八《郝天挺传》中，又属入金人郝天挺语，原语见《中州集》卷九郝天挺小传。《金史·隐逸传》采之，曰：‘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通人能之。’又曰：‘男子生世，不耐饥寒，则虽小事不能成，子试以吾言求之！’此元好问述其师郝天挺语，而《新元史》认为是元好问弟子郝天挺之言，亦一时失检也。”按《新元史》有三种版本，即：初稿铅字排印本，退耕堂刻本，庚午重订本。（开明书店二十五史所收《新元史》即是此本影印本）。如今习见的重订本中不见此语，是柯氏后亦自知其误而刊正了。但此种误解实不自柯氏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八集部·总集类于《唐诗鼓吹》有“不著编辑者姓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之语，已见前引。下文又说：“国朝常熟陆貽典题词，则据《金史·隐逸传》，谓天挺乃元好

问之师，非其门人，又早衰厌科举，不复充赋，亦非中书左丞，颇以为疑。”这显然也是把金、元两郝天挺误为一人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摘发此误乃引王士禛《池北偶谈》之说。查《池北偶谈》卷六《两郝天挺本末》条说：“金、元间有两郝天挺，一为元遗山之师，一为遗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经传》云，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晋卿，元裕之尝从之学。裕之谓经曰：汝貌类汝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继先，出于朵鲁别族，父和上拔都鲁，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受业于遗山元好问，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国公，谥文定，为皇庆名臣。尝修《云南实录》五卷，又注《唐人鼓吹》十卷。……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为《隐逸传》之晋卿，而致疑于赵文敏（按：赵孟頫）之序称尚书左丞，又于尚书左丞上妄加“金”字，误甚。”《池北偶谈》并检出《元史》有传的郝天挺不是汉人，卷七《元人》条云：“元名臣文士，如移刺楚才，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术鲁狮子，女直人也；乃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刺，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哈刺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

《池北偶谈》于金、元两郝天挺，分辨至为明晰，但应当说，王士禛还不是提出金、元有两个郝天挺的第一个人。远在他一百多年前，明朝人李诒于其所著《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两郝天挺》条已揭明此义。说是：“《唐诗鼓吹》，旧云郝天挺注，金又有一郝天挺。

《两山墨谈》亦考之不审。”查《两山墨谈》十八卷，明陈霆著。霆弘治十五年进士，书刻于嘉靖十八年，有自撰的后跋。其卷四一条云：“《唐诗鼓吹》，为郝天挺笺注。金有郝天挺者，元遗山实师之。史称其早衰多疾，厌于科举，遂不复充赋。又云：其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困穷落魄，终不一登豪富门，然则此天挺乃金时隐逸也。注鼓吹者，署云中书左丞，且谓尝学于遗山之门，然考之《元史》，其为左丞在武宗时，则知别一人也。”是陈霆检出金、元有两郝天挺，比李诒还要早好几十年，陈霆并已知《唐诗鼓吹》注者非金时隐逸之郝天挺，而为见于《元史》的别一人。说是。《漫笔》说《两山墨谈》：“考之不审”，不明何谓。我怀疑《漫笔》作者是否于《墨谈》此段文字句读偶疏，大概以“然则此天挺乃金时隐逸也，注鼓吹者。”断句，故云云。鄙意应以“……然则此天挺乃金时隐逸也。”断句，下文另起，乃作：“注鼓吹者，署云中书左丞，……则知别一人也。”于义允合，尚无“不审”。前修蒙诬数百载，末学有不能已于言者，特为辨正而昭雪之，并乞大雅之教。

按金郝天挺，就是元代有名人物郝经的祖父。郝经《元史》卷一五七有传，说“祖天挺，元裕尝从之学”云云，《池北偶谈》已引之。又《金史》卷一二七《隐逸传》有郝天挺的专传，说：“太原元好问尝从学进士业，”多据元遗山《中州集》卷九《郝先生天挺》小传为文。此外还有两条史料可以举证。一见《遗山先生文集》卷二三《郝先生墓铭》，文云：“某既从之学，先生尝教之曰：‘学者贵其有受学之器，器者何，慈与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学词赋，以速售为功。六经百氏，分裂补缀外，或篇题句读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为庸人，况一败涂地者乎？’又曰：‘读书不为文艺，选官不为利养，唯知义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贪墨败官，皆苦于饥冻不能自坚者耳。丈夫子处世，不能饥寒，虽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节乎？汝试以吾言求之！’先生工于诗，尝命某属和，或言：‘令之子欲就举，诗非所急，得无徒费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诗，正欲渠不为举子耳！’盖先生惠后学者类如此。……先生讳天挺，字晋卿，……男孙三

人，曰经，曰恒、曰彝，经最知名。”又郝经《陵川集》卷三六《先大父墓铭》：“先大父讳天挺，字晋卿。……远近俊茂，多从之学，其教人以治经行己为本，莅官治人次之，决科诗文则末也。故经其指授者，往往有成资，河东元好问从之最久而得其传，卒为文章伯，震耀一世。”这是金朝的郝天挺，因其与元郝天挺同名，而又与元遗山名有师生之义，特连带略述及之。

关于元郝天挺的事迹，可考者自然不止于本文所论，兹惟即其与云南的关系，就方志、碑记中所见，略为论次证补，兼及其易涉误解的二事，稍事考订，以存其真。至于对郝天挺全面的研究，则非本篇所能尽了。

注 释：

- ①《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所收《创建大理路儒学碑记》跋语说，夹注云云，当据碑文引于此。按非不可能。
- ②《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收录。
- ③参见《云南文物》1982年第12期拙文。
- ④碑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所收。
- ⑤此据《创大理路文庙碑》，疑即《大理路兴举学校记》之嘉议大夫签省张汝贤。
- ⑥《创大理路文庙碑》云，庙成于至元“丁亥之闰”，《新志》检出是年闰二月。《新修庙学碑阴题名记》作“丁亥之闰二”《大理新修文庙记》记立碑年月为“至元二十四年岁舍丁亥闰二月日”，合。
- ⑦收入《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具见前揭。
- ⑧见《新元史》卷三二《行省宰相年表》，吴廷燮《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
- ⑨参见拙著《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
- ⑩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1月第1版本第209页。
- ⑪原载大正五年十二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经陈捷、陈清泉译出，改题《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商务印书馆1932年12月初版本。

（上接第75页）

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整体。但是，羁縻州的设置，毕竟是“羁縻政策”的产物，充分体现了“分而治之”、“以夷治夷”、“以夷伐夷”的反动观点，不可避免地造成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分裂和隔阂，从而带来了许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同时，羁縻州的设置，在客观上承认了土酋统治的合法性，从制度上维护了落后的社会基础，使之长期停滞不前，形成各自封闭的状态，阻碍了社会进步。